

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语录

JINGDIAN YULU

3

张岂之 叶国华 主编

西安出版社

张岂之 叶国华 主编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生生不息

付粉鸽 编撰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生不息 / 付粉鸽编撰.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8.6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ISBN 978-7-80712-421-4

I. 生… II. 付… III. 传统文化—中国—通俗读物
IV. 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005 号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生生不息

主 编: 张岂之 叶国华
编 撰: 付粉鸽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68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ISBN 978-7-80712-421-4/K·41
定 价: 39.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序

张岂之

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系列丛书与读者朋友见面之际,我想简要说明一下有关情况,作为这套丛书的总序。

—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文化日益受到国内外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华文化典藏浩如烟海,要进入这座精神宝库,殊非易事。近年来,我国学人们在研究:如何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准确地向公众普及中华文化?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写出了阐释中华文化的著作,其中有学术提高性的,也有通俗普及性的。学术性与普及性如何结合得更好,大家正在探索中。这也引起身在海外学者的重视,余英时先生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号“学人寄语”中说:“中国人文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是一项不可分割的迫切任务,承担它的不仅是‘普及’作者,人文专家同样义不容辞。”

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为学生作讲演,讲中华文化悠久丰富的人文精神,当时尝试在文化研究与普及上做些工作。我将中华人文精神扼要地概括为若干方面,以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力求加以切实的解剖和分析,为年轻学子和读者朋友提供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知识,想给人们在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培育健

康的审美能力时以助益。我主编的季刊《华夏文化》也是进行文化研究与普及相结合的园地,在近二十年的办刊实践中一直保持这个特色。当然,和其他学人一样,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高深的学术研究与通俗的文化普及之间进行沟通的艰辛。多年来国内人文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陆续出版了一些受专业学者和文化爱好者欢迎的著作。

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似乎只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实际上,远没有这样简单。文化普及工作,除要求文字表达简明准确、生动活泼之外,在内容上也要有深入的研究,学者可以通过简明的文字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传达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受益。在这个方面,要重视“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有了研究心得,内容才有价值;只有“浅出”,文字简洁、生动,才能吸引广大读者。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关于建设我国现实主体文化的问题,其中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应当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经过新的介绍和阐释,以便在现代公民中普及现实主体价值观。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一建设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去做。可见,文化普及性的工作在中华文化的弘扬中意义重大。只有当人们理解到自己的工作是和建设现实主体文化相联系的时候,才会感到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2007年上半年,负责西安市理论宣传工作的王军先生向西安出版社提出倡议,希望由我和香港的叶国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选编、出版一套力求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又以普及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当西安出版社负责人向我说明这个计划后,我觉得很好。为什么要提“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意味着被邀请写稿和审稿的人,需要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素养,进行过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这样,他们做普及工作才有根底,在科学性上才有保证。为什么又要强调“以普及为主”?因为这套丛书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文化普及读物,主要面向具有中等

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群,在关于中华人文经典的阐释上,要使读者们能够看懂,并且能读出兴趣来,这样才能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让它在现实社会中滋润人们的心田。

这套丛书从确定编写方案到编辑出版,历时一年多。期间,由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先生召集,先后开了几次会议,研究编写方案、初审情况和提高稿件质量等。关于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我都参与了意见,多数稿件在初审和复审后,我都看过,而且写出了再修改的一些建议。在工作过程中,叶国华先生以及香港耀中出版社的同行也通过西安出版社提出了若干建议和意见。

本丛书第一批共11本,包括《天人之际》《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居安思危》《以民为本》《仁者爱人》《慈悲为怀》《养生有道》《明德至善》《诚实守信》《天下大同》。它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著的选编,分别考察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其对人类政治伦理生活和社会理想的影响,大体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性、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今天的学人加以阐释,体现时代性,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料。

《天人之际》,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许宁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郭荣芳。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学术文化中对于“天人之际”的艰苦探索,成为探讨个体生命价值及其与自然及社会联结的理论基石。“天人之际”不仅包括“天人合一”的观念,而且包括“天人相分”、“天人交胜”的认识,它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怎样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

《道法自然》,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郑熊博士。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今天反思和处理环境问题有深刻的思想启迪。它强调一切都要顺应自然、自然而然,反对人强行妄作。“顺应自然”的理论观点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有助于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生生不息》,编撰者是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付粉鸽博士。生生不息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它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面貌,赞颂了

人的生命尊严，展现出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它也是中华文化保持长久活力、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古人认为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天地化生的推动力，这种辩证思维具体表现为“有对”精神、“会通”精神和“中和”精神。

《居安思危》，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战峰博士。《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它是中国以儒道两家为主干的“百家之学”的共同认识。它从事物变易转化的高度观察和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发展，提醒人们关注治乱、兴衰的转换，提高预察事物的认识和能力，树立常备不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反映了人们以史为鉴、努力实现长治久安的自觉性。

《以民为本》，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淑萍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王夏红。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等。它在本质上是君主制下的爱民、重民、保民、富民、乐民的观念。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全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仁者爱人》，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杨永亮。“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和根本。孔子阐述“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儒家主张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广去爱别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名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述。

《慈悲为怀》，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宋玉波博士。“慈悲为怀”是佛教教义，其哲学基础是缘起理论，力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去看世界万物。它体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与深沉的宗教情怀，是对人类常情的一种升华与超越，不断激励人向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建设美好和谐的人间社会具有激励意义。

《养生有道》，编撰者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张应超研究员。中国医药学与养生学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尊重生命成为中国医药学和养生学的核心观念。古代思想家大多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与个人的修养功夫有关，重视

德行，知足常乐，淡泊宁静，养气保神，注重饮食起居，导引按摩，从而使养生成为身体与精神相协调的具体行动。

《明德至善》，编撰者是西安文理学院王美凤副教授。《礼记》中的《大学》篇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明德”是一个长期的学习、修养的过程。古人不断追求和践行君子之道，通过修身养性使精神达到至高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不靠天赋，也不靠家庭门第，而是要凭借自身的精进努力，充分彰显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意义。

《诚实守信》，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李江辉博士。“诚”“信”是古代思想家对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成果之一。《礼记》中的《中庸》篇称“诚”为天道，称向“诚”学习为人道，可见，人道就是使“诚”得到实现，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诚信强调名实相符、言行如一，包括诚实和守信两个方面，它们也是人道德品质的一种表征。

《天下大同》，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礼记》中的《礼运》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它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虽然“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但是它也同时吸收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是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文化精神的结晶。

丛书各册均围绕一个主题，根据编撰者对相关历史文化及思想家语录的梳理分析设置章目。体例由导读、原文、今译、时析、参考文献组成，个别字句适当加以简要注释。“导读”介绍各分册的主要内容和编撰者的研究心得，它有助于读者了解各专题的思想要点和编撰情况。“原文”所选条目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经史诸子典籍，力求言简意赅，具有理论性。不少条目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具有普世价值，对当今现实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今译”力求准确流畅，通达雅洁。“时析”是本丛书的特色之一，侧重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

参与这套丛书编撰工作的学者,最年长的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应超研究员,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养生学的研究;其余都是中青年学者,大多数具有历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经历过良好的科学研究训练,撰写发表过学术论文,目前在高校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哲学等专业的科研教学工作,具有承担相关主题编撰任务的学术素养和能力。

各册初稿完成后,都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个阶段。初审工作主要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负责。在初审意见基础上修改后的二稿,则进入复审环节,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刘学智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分别承担。在复审意见指导下对二稿进行修改斟酌,形成三稿,进入终审环节。多数稿件经过我审阅,并对所阅分册分别提出具体意见,少数分册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陈学超教授审定。通过终审的稿件,再加以润色调整,移交西安出版社。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和策划,每个分册安排有专门的责任编辑负责编辑和技术处理工作。此外,这套丛书先行在内地出版中文本,再由香港的叶国华先生负责主持,译成英文,形成中英文对照本,以便在海外发行。

应该指出的是,编撰一套较好的、分量不大、可读性较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并非易事,这项工作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才能做得更好。

我诚恳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贴近大众生活,为读者们学习中华文化提供一些便利条件,至于其中的错误和不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2008年6月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序

叶国华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经编撰团队同仁辛勤不懈的努力，终于出版面世。2007年春天王军先生提出这个倡议，得到张岂之先生和我的赞同。随后，我们在丛书编选方式上很快达成了一致，包括按主题选材，采取今译时析的体例，等等。负责编撰审校的各位学者付出了大量心血，岂之先生住院期间和康复出院在外地出差过程中，仍经常关心过问编撰进度和质量，通过多种方式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丛书在队伍组织上的一个特色，使得香港的耀中教育机构的学者也参与了工作，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拉扩一些现代普世价值的视角，并在将来的海外出版中，担当一个中西沟通的桥梁作用。

参与这项重要工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对我这个香港人更有着特别一些的意义。我生在二战时的殖民地，知事时适逢抗战胜利，中国位列战胜国五强，自幼便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环境。此后的政治环境变化迅速，我们这一辈人在成长中又经历了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起伏变迁的深刻影响；但因身在境外，有机会相对稳定地学习与生活，当然也有身处殖民地的抗争与曲折，但总的来说可以有一个自由思索的环境，故在对祖国保持深爱的同时，也对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连串问题常进行思考，如：为何中国能强大两千年，而近代以来又衰落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三十年，中国终于走上了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此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与效果如何？奥运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又会如何？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吗？2050年中国达到小康后，中国人将在世界上展示什么形

象？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人口占如此大的比例，我们对这个星球及她所承载的人类万物能有同比例的爱护与贡献吗？九百多年前张载就提出民胞物与，届时人们还有此理解与抱负吗？传统文化经典中蕴藏着大智能，从中撷取那些闪烁着永恒之光的金石良言，温故而知新，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是会有不少启迪的。

我们在承传与创新传统文化中，也要有世界的视野与责任。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就动摇了世界的原有秩序，引起原秩序得益者的种种回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循序渐进，加强沟通，学习别人，介绍自己，还要对原有秩序有建设性的调适与尊重。二百年以来，我们看世界特别是西方，与中国是对立的关系，到了新时代，这种对立应成为包容，即“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对于中华文化，中国人要有爱、温情与敬意，也要在比较与认知的基础上，有建设性、批判性的新解，找出与全球价值接轨的内容，让全人类都有所了解、有所融会，才能参与回应 21 世纪全球人类的共同问题。中国人对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文化与价值观亦应持了解、欣赏、学习、借鉴的态度。今天，世界各种文明已走向休戚与共的整体，中国也已是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达成世界良治的利益相关者，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人民与地球万物的成比例的造福者。我们出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也希望在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庙大成殿有匾额“中和位育”，这是我近来常提到的一个哲理，它对个人、机构、社会、国家都极有指导价值。好的文化与制度，就在于为人在世界找到适应的位置与关系，同世界和谐相处，才能健康地生存与发展。经过百年屈辱的中国，在取得诸如经济腾飞、成功举办奥运等成就后，要的也是“中和位育”，不强出头，泰然处于大千世界而达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之境。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点新解吧！

中华经典博大精深，无论我们多么认真细致，倾力以赴，编撰当中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更因以今人认知加以选择诠释，则难求全，故只算是抛砖引玉，开一个头，以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发扬作一个新的尝试。

2008年6月于香港清水湾

导 读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世代绵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宛如一条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大江。在历史变迁中，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巨大生机和活力而从未中断，表现出极强的整合性、稳定性和创新精神。可谓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生生不息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开始，“生生”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生生”指承认变化，且变化中时时有新的东西产生。后来宋明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等继承《周易》思想，强调“生生”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认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指出阴阳二气互相作用感通，化生天地万物，万物生而又生，变化无穷。二程则明确地指出天地自然之道在于化生不已，“道则自然生生不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后来的清代学者戴震从唯物主义气化论角度给予解释，认为“气化流行”是“生生不息”的总过程。经历了各代不同思想家的阐发，生生不息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保持长久活力、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那么，中华文化这种生生不息的品性是如何形成而又怎样呈现的呢？

在中国古代先民的视野里，生命弥漫于宇宙之中，宇宙间的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的生命场所。生命的不断孕育和化生是天地德性的体现，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生养万物是天地至上的品德。天地的这种生养大德无穷无尽、没有止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天地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朱

子语类》卷五十三)因此,“宇宙”^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死寂的、机械的物理时空结构,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生命场所。基于此,中国人的宇宙观从来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不是片面的而是整体的,此种有机宇宙观与西方人的机械宇宙观截然不同。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的:“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

那么,天地为什么能化生不止、生生不息?古人认为天地是对立性因素的统一,其中阴阳之间的对立和互相作用是天地化生的根本原因。阴阳,最早指山水的背向,后来逐渐用来指代两种不同的性质。古人认为,宇宙及其间的每一物,都包含着阴阳两种属性,阴阳两种不同性质互相作用构成了宇宙及万物,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都认为阴阳相互作用化生宇宙万物,阴阳的相互作用就是宇宙之道。这个“道”就是宇宙化生之道,“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原善》)。清代学者戴震将阴阳化生与宇宙生生不息的内在关联性明确地揭示出来,指出阴阳变化的实质就是天地的化生之道,是天地宇宙不断产生和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古人在认识宇宙、探讨生命时,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阴阳,在阴阳的此消彼长中,生命被展示。正由于古人一直从阴阳两种不同性质的对立和统一中理解和把握宇宙及万物,因此,他们对宇宙的认识总是坚持一种辩证的和谐的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将阴阳作用与宇宙化生和生生不息相结合,而且更进一步以宇宙生生不息为大背景,赋予许多伦理概念以

① “宇”“宙”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作品《尸子》中,“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可见,“宇”表示空间,“宙”表示时间。而“宇宙”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中,“旁日月,挟宇宙”(《齐物论》,该书中“宇宙”多次出现)。“宇”是整个空间,“宙”是整个时间,宇宙即是整个时空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宇宙”和天地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生成论意义。他们从生命、生命不断相续的角度,解读古老文化中原有的概念,使古老文化能够随着时代变迁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①

阴阳化生成就了宇宙生命,人作为宇宙万物中具有智慧的一类,其生命的价值就不单是延续自然生命,更在于要体认宇宙阴阳化生之道,积极地参与宇宙化生。这就是要参赞天地之化育,追求道义,以道立命,即王夫之说的“因天之能,尽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圣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质,使充实光辉者,皆若此”(《张子正蒙注》卷八)。如此,才能形成宇宙大德,体尽天地生物之心,实现人生价值。

当然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人自身的积极努力,需要具有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因此,古人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天道刚健有为,君子仁人应该效法天,不断进取,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的宽容博大胸襟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由于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包容品质,使中华民族每每在危难之际,能够重新崛起;在困难面前,永不放弃,一次次挽救了国家和民族。它们已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入人心、泽被广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再铸辉煌。

除了效法天的刚健有为和地的敦厚宽容外,古人们在认识宇宙天地化生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阴阳对立性和统一性在化生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辩证法精神。中国古代的先哲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大地,中通人事,天才地猜测到事物是由对立性因素组成的,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转化,产生了万物,推动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形成了阴阳互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这种阴阳互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优点和特点,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对精神。从《周易》的阴阳相摩、刚柔相济到宋明理学家张载的“两不立,

^① 对传统概念的生成论式解读,在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他们对于传统的“仁”“义”“诚”等伦理道德范畴的新理解。如周敦颐的“生,仁也;成,义也”(《通书·顺化》),张载的“益物必诚,如天之生物,日进日息”(《正蒙·乾称》),都是从化生、生生不息的角度来理解以往被当做道德规范的“仁”“义”“诚”,赋予这些概念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

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和朱熹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朱子语类》卷九五），再到王夫之的“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都将事物看做矛盾的统一体，在对立中理解事物。二是时中、不偏不倚的中和精神。“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是一个单纯的刻画机械变化的物理单位，而更多是在体认自然变化前提下，表征人事活动与自然变化协调统一的概念。古人以天事推及人事，因此，特别重视与时变化，强调对时机的把握，“因时制宜”成为古人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这种“因时制宜”的活动准则是在对事物各种具体情况考察基础上，立足全面之后的协调权衡，是协调事物对立性后的适度和中正。这种适度和中正恰恰就是天地的秩序和人类存续的法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由有对和趋时而中，中国古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辩证逻辑系统。从辩证逻辑出发，中华文化从不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态度去认识宇宙和万物，而是从矛盾的观点，在承认对立中追求和谐，“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这种在矛盾中追求和谐的理念为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辩证的精神是一种变化发展的精神。在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中，新质的东西不断孕育、壮大，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创新，是辩证精神的逻辑必然。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创新，强调生生不已就在于不断创新，变中求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熠熠生辉的亮点。这种变中求新的精神，被中国古人称为因革损益的革故鼎新精神。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从无形的精神和制度到民间百姓的日用生活，中国人处处都在求新，对那些止步不前、沉迷守旧的行为，中国人历来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此，从上古时期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到《周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再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内篇》，创新不已的思想已经渗透于各代文化之中，成为超越于各代文化特异性之上的一种共有品质。这种品质培养和塑造了一个拥有不断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民族，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明。面对新的历史时代，中华文化特有的创新精神又一次被彰显，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显身手。

本书主要从生机勃勃的宇宙、阴阳化生、生以载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对、时中和日生日新八个方面来说明和阐述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品质。对宇宙的体认是形成生生不息思想的逻辑起点，宇宙是包含万物生命的生机勃勃的天体。这种生机勃勃的活力来自于阴阳两种对立性力量的互相作用。阴阳作用化生万物，中国人一方面以此解释人的生成和价值，即人作为宇宙万类中的一类，禀天地阴阳之气和合而成。对人而言，在重视形体生命保全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精神生命的崇高，希冀在参赞天地化育中，确立自身的价值，求得道义的完满。这种求道重义的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国人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博大宽容的厚德载物品质。另一方面从阴阳化生的认识出发，中国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辩证法精神。这种辩证有对精神，要求人们从对立统一的态度出发，以时中为原则，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认识世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变通中不断创新。

付粉鸽

2008年2月于西北大学

目 录

序	张岂之	1
序	叶国华	7
导读		1
生机勃勃的宇宙		1
阴阳化生		15
生以载义		41
自强不息		60
厚德载物		94
有对		115
时中		134
日生日新		176
参考文献		191
跋	王 军	194